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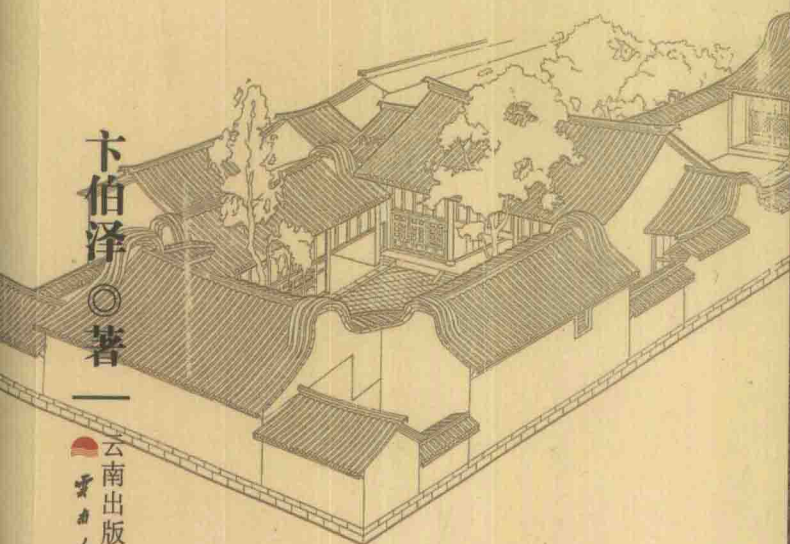
会馆文化

会馆文化

上

卞伯泽◎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会泽文化之旅

会馆文化 (上)

卞伯泽◎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书名题字 于光远

顾 问:

原中共会泽县委书记 何汝利

政协会泽县委员会主席 马玉聪

中共会泽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潘利华

摄 影 周朝祥 黄兴稳

图画供稿 胡家源

资料提供 马 华

序一

中共会泽县委书记
会泽县人民政府县长

陈国宝
梁志强

一个时代或一代人离世而去，他们把自己最大的创造——建筑留了下来，这就是享誉中外的会馆群体。

会馆，这种由土木精心构成的建筑，它不仅是一座精美绝伦的艺术精品，更是一座集中华民族传统哲学思想、民族伦理、商业理念、民俗文化等为一体的文化博物馆。

古人说：“馆，客舍也；待客之舍曰馆”。所谓会馆，即“聚会寄居的场所”。清朝中叶，会泽经济伴随着清王朝对这一地区的改土归流而得以复苏，在这块土地上，地主经济取代了几千年的半牧半农奴隶制经济和封建领主经济，并出现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生产关系的转变，把会泽的铜商经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当时，以县城为中心，形成了西边以铜矿开采为主的铜矿工业园区，东边以铅锌开采为主的铅锌工业园区，这两个产业带，极大地带动了县城的经济发展，使会泽县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农耕文明向商业文明的转型，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会泽的铜商经济达到了十分繁荣的境地。在这一过程中，由江南及湖广一带移居云南的移民又从一些州县大量移居会泽县城，他们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建宗祠、盖会馆，一时间，100多座会馆寺庙宗祠在这块土地上拔地而起，形成了会泽特有的文化奇观，获得了“会馆之都”、“寺庙之城”的赞誉。

据有关专家研究，遍布中国大地的会馆，可分为官绅试子会馆、工商会馆和移民会馆三种，处于边陲蛮荒之地的会泽，因其铜矿及铅锌开采的原因，各地移民和各种行会纷纷建馆立庙，据卞伯泽先生最新的研究成果，仅会泽县城，就有44座（个）移民同乡会馆和同业会馆。这些会馆，几乎创造了中国会馆的几个之最：一是全国会馆门类最多的县城，从级别上划分，有国家级（缅甸移民会馆）会馆一座、省级会馆八座，府、县级会馆六座，这种一县就涵盖国家、省、府、县四级会馆的现象十分少见，仅此一家。从内容上划分，除京城独有的会馆外，移民同乡会馆和同业会馆在县城均有建盖，且形成了较大的规模。二是规模最大的会馆在会泽，建于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

年)的江南会馆,占地23000平方米,由关圣殿、白衣观音殿、吕祖阁三个建筑群体组成,该馆除较大的建筑群体之外,还设计了梨园和竹林,并引灵壁山之水入园,是一个十分具有江南园林布局之美的会馆。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材分析,不管是占地的宏大、还是建筑群体的伟峨,以及它“古木千章抱,流泉一径通”的园林风韵,的确可称全国规模最大的会馆;三是会馆数量最多的县城,这在学术界,是早已形成的共识,且不说44座(个)移民同乡会馆和同业会馆,仅现存的八大省级会馆,也可以在全国独领风骚,不可逾越。

会泽县城的会馆群,它不仅是会泽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颇具特色的城市名片,也是会泽发展旅游产业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而作为中国会馆最多的县城,却没有一本专题研究介绍这方面的书,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近年来,年近七十的原政协副主席卞伯泽先生,不辱使命,历经五载,六易其稿,站在一个全新的学术高度,用最新的观点,诠释了历史上会泽会馆群存在的状况,最后完成了他的系列丛书之四——《会泽文化之旅·会馆文化》,终于弥补了这一缺憾。其书的出版,将为构建会泽历史文化大厦以及发展会泽旅游产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及为家乡添砖加瓦的情操,使人感佩。

《会泽文化之旅·会馆文化》是一部近40万字的宏篇巨著,作者不仅阅读了近些年出版的大量有关会馆的书籍,获得了学术界对会馆研究的最新成果,还收集了大量有关会馆的文献典籍、碑刻、牌匾、手抄楹联,进行了甄别校勘,吸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另外,作者还对熟悉会馆的耆老及会馆成员的后代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增加了不少生动的口碑资料。作者童年时的美好记忆,更使该书显得史料翔实,观点新颖,厚重多姿,更加贴近会馆实际,有很多问题尚是第一次提出,如会泽县城所建移民同乡会馆为一国十一省五府一县共15处,同业建庙12处,用业建殿17个,共44处(个);缅甸移民所建的莽子庙应为“缅甸会馆”;把同业之人所建寺庙归为会馆之列;在“会馆之都”及“寺庙之城”的背景下,第一次提出了“众神之域”等等,另外,对会馆的组织形式及管理机构,以及会馆的经济来源和支出,会馆的社会功能等,都有很多别开生面,十分有见地的阐述。加之周朝祥、黄兴稳同志数百张精美的图片,更为此书增辉添彩。此书的出版,为进一步研究会馆及会馆文化提供借鉴,定能提升会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是为序。

2010年12月6日

序二

原来会泽会馆这么有意思

郭兴良

1961年赴北京读大学前，我一直生活在会泽县城。那时，除上学读书外，我和小伙伴们到处去玩：庙里看菩萨，会馆瞧演戏，城楼观街景，茶铺听说书……可谓“十处打锣九处到，哪里热闹往哪跑”。当时，会泽会馆活动频繁，庙宇香火旺盛，我们随时都会跑去玩，热闹凑了好多，门道却一点不晓。不过，那风貌各异的众多庙宇、会馆及其活动的百样景观，则深深烙印在了我童年、少年的心中，并成了我走遍天南海北也挥之不去的思乡情愫。

如今，我年届古稀，多年从事古代文学、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近年更多情注于家乡会泽的历史文化。当外地学生、朋友问及会泽会馆的种种时，我虽也能告之一、二，但总觉情有所负、憾不能祥，颇以陆机“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文赋》）之状为然。

现在，伯泽耗时五载、六易其稿的新著《会泽文化之旅·会馆文化》面世，让我有了从容对答关心会泽会馆诸君的一个可资范本。而较之往昔的有限认知，此次品读卞著，我还是生出了几个“想不到”：

一、想不到会泽会馆的内容这么丰富

人们习称会泽为“会馆之都”、“寺庙之城”，自然缘于其数量之多，会泽人也以一小城竟拥108座此种古建而自豪。但这“108”之说有何根据？其历史与现状如何？就难明其详了。本书通过设置名称、别名（行业名）、建盖时间、类型、祀别、被供奉者、祭祀时间、所在地、保护情况等诸项列表统计，得出新中国成立前，会泽县城及近郊至少建有庙宇81座、会馆27座，另有宗祠11座，总计不下119座的结论。由于这个统计来自作者的文献考索、调查采访、实地踏勘，故其精准性毋庸置疑。不仅如此，作者还对这108座寺庙、会馆从信仰崇拜和祭祀性质两个视角作了细致分类，并逐一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扫描”，其蔚为大观足令人叹为观止。

本书描述会泽会馆内容的丰富，既表现为宏观拓展，也表现为微观通幽。从宏观说，作者既从纵的方面叙写了中国会馆的历史沿革，又从横的方面介绍了全国会馆分布的概况，甚至延伸到了华人在海外建的会馆，这就在一个大视野的背景上将会泽定格为历史上、世界上“会馆最多的县城”了，从而也顺理成章地将会泽送进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林。从微观看，作者对所有庙宇、会馆的性质、方位、由来、功用、现状、供奉者、建筑风貌、轶闻趣事以及所涉的各种数据作了细致梳理，捋得清清楚楚，几乎达到锱铢必究的地步，从而具有了很强的文献性、史证性。

会泽会馆内容的丰富，还表现在庙会节庆与众多楹联上，书中依次列出了从农历正月到腊月共65个节庆庙会，一年到头庙会连连，节庆不断，热闹非凡。会泽山川形胜，人文荟萃，撰联、赏联之风脉连意贯，书中经过比对校勘，从寺庙、会馆及庙会的众多楹联中辑录了216副，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会泽会馆的文化精彩。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专门写到了“祠堂”。作为家族供奉和祭祀祖先的特殊建筑，是封建时代集中体现族权的载体，是中国封建宗法制的物化象征。虽然后来有做过皇帝或封过侯的才可称“家庙”和一般家族称“宗祠”的分别，但从凝聚家族精神、提供活动场所、讲究建筑规制的角度说，我觉得不妨将祠堂称作“家族会馆”，换句话说，研究会泽会馆文化是应该涉及祠堂的，从扩展旅游文化的角度看，祠堂也不该忽略，曾经作为红军长征时九军团司令部驻地的牛家祠堂、环境清幽的容家祠堂、发儒街雅致的刘家祠堂等，都有其特具的文化价值，对此，卞著虽然展开不够，却也引发我作进一步的思考。

二、想不到会泽会馆的内蕴这么深邃

读完全书，我感到这些由土木材料建盖的庙宇、会馆，不是一般的建筑物，而是会泽历史文化绽放的奇葩，逾百座庙宇会馆，无一不是会泽历史文化物化的洋洋大观。

这样一个建筑群究竟负载了怎样的历史文化呢？作者认为，它体现了会泽土著文化与诸多客籍文化、士绅雅文化与庶民俗文化、传统文化与近现代文化三个方面的对接与融合，因而它所反映的是会泽奴隶制经济、领主经济向封建地主经济（笔者认为还应加上早期商品经济）过渡这一社会转型期的历史特征，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现代文化迈进过程中的文化特征。

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角度，作者既肯定了会馆的历史功能，即它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由专制制度和宗法制度相结合而形成的“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局部地实现了对传统社会管理制度的超越，尤其表现出在管理流动人口、迁移人口社会整合功能方面的优越，又特别指出其由赈灾济贫、创办学校、沟通协调、凝聚人心、积极进取、

健康竞争、发展地方经济等等活动凝炼出的“会馆精神”，对于当今动员基层民众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对于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特殊的借鉴意义。

即使是由众多神祇散发出来的宗教精神，在敬畏自然、保护生态，抑欲制恶、教人向善，消狂息躁、涵养情性等方面，也不失为可堪新用的文化资源。会泽春节时人们涌进寺庙会馆“过素年”的那种情景所透示的文化信息，是值得忙碌奔波的当代人沉思一番的。

总之，当重新审视会泽会馆、庙宇所体现出来的“会馆精神”、“宗教精神”时，我感到它们依然鲜活，值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地加以创新、发展、利用。

三、想不到会泽会馆的故事这么有趣

本书是探究会泽历史文化的学术著作，却能吸引我一气将全书读完，原因之一是作者写得十分有趣。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引入会泽民间故事传说。如牛王庙为什么供奉牛王？传说古代收成极低，人们生活很苦，玉帝为省粮食开销便派牛王下凡传旨：“金锅银甑，三天一顿”。牛王同情百姓，将圣旨私改为“铁锅木甑，一天三顿”，玉帝闻知大怒，把牛王贬到凡尘犁地拉车磨面，不许再回天庭，于是牛就永远留在人间，成了人们敬重的“牛将军”、“牛王菩萨”、“牛王大帝”，而牛成为人们供奉的牛王，正反映了会泽农耕时代对牛的珍视。类似如许逊怎么由人变成“仙”、福禄寿“三星”是怎么来的、韦驮与观音怎么会是一对没有成婚的“对面夫妻”、江西庙土地菩萨为什么不像其它土地着布衣而穿“官服”、会泽城隍庙为什么会破例在后院增建一个供城隍夫妻享受情爱的寝宫等等之类的故事传说，还有很多。作者写这些故事传说，不在搜奇寻怪，渲染虚幻神力，而在探寻人文内蕴，因而成了一种既有趣味又发人深思的文化解读。

二是破解人们司空见惯却不知其所以然的“谜”。100多座庙宇、会馆留给人们的不解之“谜”实在太多了，如会泽人为什么把“矿王庙”改叫“礅王庙”？为什么会泽的“马市”会兴旺？为什么马王庙只有一个殿而供奉的不是马王却是弼马瘟孙悟空？为什么火神庙的香火之旺仅仅次于财神庙？为什么戏剧业将唐玄宗昵称为“老郎君”？为什么碾米业崇奉的不是水神稻神而是雷公神？为什么食馆业尊崇的是灶君而非中原人尊崇的隋文帝厨师詹王？为什么大禹成了湖广的地域神？为什么吕洞宾成了金银器业的开山始祖？为什么观世音要讳“世”字而只称“观音”？为什么会泽人在除夕夜要剪红纸葫芦倒贴在门窗及器皿上？为什么会泽人将那些态度和蔼的人称做“和合二仙”？为什么无赖之徒被人们叫做“小神子”？为什么人们动辄就呼“阿弥陀佛”？还有关于地藏、八仙、城隍以及喝酒行令的“五魁首”是什么意思？等等，这一切好像是走进会泽庙宇会馆的“拦

路虎”，本书逐一破解这些大大小小的“谜”，不仅搬开了“拦路虎”，让人登堂入室去充分领略会泽会馆的特异风采，而且在兴味盎然中不经意便陡增了许多关于会泽历史文化的知识。

三是渗入作者童年、少年的美好回忆。作者近70年一直没有离开过会泽故土，在叙写中情不自禁渗入了许多亲身的经历。这不仅使本书弥漫着浓浓的乡情，而且让人尤其是会泽人读着读着便沉浸到对往事的美好回忆中去，即如从小在会泽庙宇会馆群中往来穿梭玩耍的我，读这些文字不仅感到亲切，而且在静心捡拾过往那些一个个精彩有趣的瞬间时，不禁思绪绵绵、情怀悠悠……

本书名曰《会馆文化》，但不少内容未涉会馆而只及庙宇，我意改为《会馆庙宇篇》更切；对于“宗祠”用笔太少，也觉似显不足。

全书配用的周朝祥、黄兴稳两位同志数百帧精美图片，不仅具有很强的图注性、认知性，而且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为本书增色生辉不少。

众多庙宇、会馆将博大精深的会泽历史文化物化为矗立在乌蒙大地上的建筑群，它们像巍峨的丰碑无言地诉说着古城曾有的辉煌，它们精彩地定格了过去，更昭示着新会泽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未来。

有人问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是什么？”托翁回答：请你把全书读一遍吧！如今，若有人问我“会泽庙宇会馆有什么意思？”我的回答是：“请你读读卞伯泽这本书，最好亲自到会泽去看看！”

这篇序，就作为我向诸位发出的真诚邀请吧。

2011年4月1日



目 录

序一	陈国宝、梁志强	
序二	郭兴良	
引言		(1)

壹 百年沧桑话会馆——中华会馆概览

第一节 会馆的定义及历史沿革	(8)
第二节 全国会馆分布的基本情况	(12)
一、晋商所建的山陕会馆	(12)
二、赣商所建的江西会馆	(19)
三、楚商所建的湖广会馆	(21)
四、中华会馆之最	(24)
第三节 华人在海外建的会馆	(27)

贰 庙宇之都及会馆之城

第一节 会泽县地理位置及历史沿革	(32)
第二节 独树一帜的铜商文化	(35)
第三节 庙宇之都及会馆之城	(40)
一、会泽石城的筑建	(40)
二、蛮荒檄外移民城	(46)
三、一座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城市	(53)
四、一百零八座寺庙、会馆之城	(69)

叁 全国之最——中国会馆最多的县城

第一节 会泽会馆群总述	(106)
第二节 同乡会馆	(113)
一、国家级会馆	(113)



二、省级会馆	(114)
三、府、县级会馆	(135)
第三节 同业会馆	(143)
一、同业建庙	(144)
二、同业建殿	(153)

肆

众神之城中的会馆神祇

第一节 会泽会馆群的神祇脸谱	(178)
第二节 众神之城	(224)
一、自然神	(224)
二、上古诸神	(226)
三、行业诸神	(228)
四、地域诸神	(231)
五、民俗神	(232)
六、道教诸神	(237)
七、佛教诸神	(241)
八、儒家诸圣	(247)
九、西方诸神	(250)
第三节 会泽神祇世界的特点	(253)
一、庞杂性	(253)
二、世俗性	(253)
三、地域性	(260)
第四节 神祇世界与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262)
第五节 神祇世界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270)

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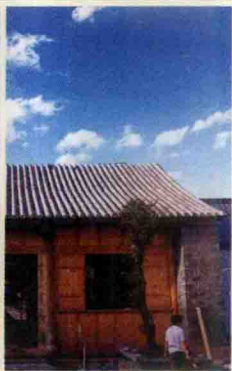
会泽建于外地的会馆

第一节 建于寻甸倘甸的东川会馆 (508)

第二节 建于昆明的会泽会馆 (513)

一部会泽会馆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
——关于《会泽文化之旅·会馆文化》的审读意见 (513)

主要参考书目 (515)



引言

“争修会馆斗奢华，不惜金银亿万花”。

2007年，国务院将赣（江西）、楚（湖南、湖北）、淮（安徽、江苏）、黔（贵州）、晋（山西）、秦（陕西）、闽（福建）、川（四川）、滇（云南）十一省于云南会泽所建的江西会馆、湖广会馆、江南会馆、贵州会馆、陕西会馆、福建会馆、四川会馆、云南会馆等八座会馆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此，会泽的八大会馆进入了国家级的保护范畴。若再加上江西等省下属府、县两级于会泽县城所建府、县两级会馆6座，以及缅甸移民所建会馆一座，不同行业所建会馆12座和云南会馆偏殿的17个行业所建的同业殿堂，处于西南地区的会泽，就以44座（个）会馆列于全国县城之首，成为中国“会馆最多的县城”。这些会馆，除部分已不复存在，大多保存尚为



20世纪50年代初的会泽县城，石城巍巍，像是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和所经历的风云。（会泽文联供稿）
云开牯岭三千丈，梦幻名城十万家。
铜脉相承逾百代，钱币一枚傲天涯。

完好。“会馆之城”成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一张最靓丽的名片。

会馆，这种生长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组织形式出现于明、清时期，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历史产物。这种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接纳同乡和同业之人活动的场所，是一部由土木材料构成的史学巨著，也是中国一部独特社会经济史和独特的文化史。会馆凝集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在数百年的历史中，作为“乡土之链”的会馆，始终呵护着侨居异地的商人游子及移民。它的出现和消亡，折射了清王朝社会经济由复苏到乾嘉盛世乃至衰败的历史过程。一个多世纪以来，建于中国大地上形形色色的会馆，因历史的发展，政治制度的变迁已面目全非，濒于湮灭。“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有的已不复存在了。因此恭谨地梳理这些残片，既是对历史的负责，又是对未来的交代，解读这中国独有的文化符号，实际是在解读明清以来一部鲜活的社会史。

从社会政治结构看，会馆的出现，它打破了上千年专制制度和宗法制度相结合而形成的“家国同构”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格局，自孔子提出“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也”，儒家的礼成了封建社会国家的精髓，而根据儒家的“礼”而形成的“家”与“国”的“家国同构”的体制，伴随着整个封建社会，一直沿袭了上千年。出现于封建社会晚期的会馆，这种不以家庭、宗法乃至宗教为主，而以邻里同乡或同业为结的组织，显示了对其家族组织的超越，成了明清时期社会政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那一时期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的产物。

中国自有城市以来，就形成了一整套以家庭为基础的城市坊厢制和乡村的保甲制，封建王朝正是通过这些基层组织来实现对广大人民的管理。这种制度随着封建王朝的更替也一直沿袭了上千年，它对于中央的集权和社会的稳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会泽，清政府于改土归流后实施的城市街巷制和四乡八里制，正是这种制度在一个地方的具体反映。在明清两朝兴起的各类会馆及行业组织，它游离于传统的管理制度，显示了超越行政职能之外的特殊的优越性，这种通过地缘和业缘所组成的传统社会组织，它建有规格不一的会址——殿堂、庙宇，形成了社区化的基层管理机构，制定了自己的“同乡之约”及“同业之约”。这些自发组建的会馆和行业，成为了明清时期除官府行政管理外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管理形式，发挥了官府行政管理不能替代的作用。

在中国，地区的人口流动频繁，有时甚至是大规模的，如明清时“湖广填四川”的人口大流动。明初沐英、傅友德率江南籍人对云南的征讨，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人口流动之多，为历史所罕见。这种人口流动，总是不断打破稳定的社会格局，导致社会的动荡和重组，如果这些流动处于无序状态，就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有时会形成王朝的更替。而会馆组织在管理流动人口方面独擅其长，依靠的正



在古城西，是古塔，古塔下是新修的通宝路，路中的汽车，可经国道213驶向天涯海角，历史，现实，未来，在这里交融得那么完美。

朝见千车驶大道，晚看玉兔戏塔尖。

堂琅旧址雍州地，留得古城赋新篇。

是同乡间的“熟人”纽带，清朝时期会泽县城对一国（缅甸）十一府移民的管理，正是各地于县城所建的会馆组织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如县城的缅甸会馆内部就有“铃记号纸，约束其民”，即通过朝廷所赐以的土官印信，用来约束移居的缅民的管理方法，成为对大规模移民管理最有效的范例。

从经济发展的情况看，某一地区会馆的出现，是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会泽县城内的会馆，它是伴随着会泽铜商经济的繁荣而出现的。随着清政府改土归流的深入，中央集权终于在这一地区站住了脚跟，也为会泽乾嘉时期铜商经济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改土归流后，彝族土司、土目的奴隶制经济及领主经济寿终正寝，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即封建社会的地主经济开始会在泽出现，这种新型的经济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会泽的经济得以复苏，出现了“野安耕凿，户接弦歌”的盛世局面。清朝中叶，会泽矿业的开采、冶炼、外运已达相当的规模，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的西边以铜矿为主的铜矿工业园区，东边以铅锌为主的铅锌工业园区，这两个产业带成为会泽采、冶、铸、运一条龙的经济体系。这个体系，上通朝廷，下结官绅，北上南下，商路达万里之遥，所铸钱币领全国之先，曾一度执全国铜矿产量之牛耳。一时间，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淘金者，这些移民在矿山发迹后，置田产，起阁楼，建会馆。会泽县城44

座（个）移民同乡会馆及同业会馆的建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从文化的情况看，各地于会泽县城所建的会馆，实际上是一次地域文化的大迁徙，各种文化的大融合。由于会馆的建盖，缅甸的小乘佛教文化，江西的万寿宫文化，湖南湖北的大禹王文化、福建的妈祖文化、四川的二郎神杨戩文化、贵州的黑神南霁云文化在会泽县城安家落户，争奇斗艳。这些文化，它不但维系着迁徙于这一地域的外籍移民，成了这些移民的精神寄托，也极大地丰富了当地文化内容，在相生相融，美美与共中，完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对接与融合：

一是土著文化与客籍文化的对接与融合。移居会泽的客籍移民，在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与会泽世居的土著民族有着很大的差异。移居之初，这种差异也曾演化为某种冲突，会泽雍正八年的“庚戌之变”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上正是土客两种文化的大较量。但移居会泽的客籍移民，为了扎根于此，通过会馆来吸收当地文化，尊重当地土著民族的风俗、习惯，谋求协调土客矛盾，继而进行相互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长期的交往中，逐渐实现了土客矛盾的对接与融合。

二是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对接与融合。这里指的雅文化与俗文化即士绅文化与庶民文化，士绅文化较多儒家学说的内容，庶民文化则又包含了许多道家、佛家的元素。会馆建盖之初，神灵崇拜为单纯的乡土神，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馆的神灵崇拜从单纯的乡土神日渐过渡到崇祀乡贤、名士的阶段，于是会馆便神上加神，日显复杂。通过这些众多神灵的设置，士绅文化中的忠、孝、节、义便悄然融入庶民文化之中，会泽县城江西吉安府所建的二忠祠，供奉的是致死不愿投清的李邦华。由江西会馆供奉的俗神许逊到吉安会馆供奉的名士李邦华，正是雅、俗文化碰撞与对接最生动的范例。另外，108座会馆寺庙就有戏台30多座，每逢庙会，既祀神又娱人，儒家的忠、孝、廉、节就是通过丝竹管弦所奏的俚曲俗调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成为士绅文化与庶民文化相互交融的载体，雅俗文化互相渗透的最佳场所。

三是传统文化与近现代文化的对接与融合。会馆建盖之初，人们把传统美德的继承放在首位，《东川湖广会馆传书》中说“唯楚有才，人孰无德”，“余以为诸君子积金、积德遗于子孙，二者固相须而为用也，而有时遗德之昌更甚于遗金之远”。这正是这种注重传统美德的反映。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近现代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会馆为了适应这一现代社会的变迁，也在不断进行自我更新。清末民初，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处于激烈变革的时期，会泽县城的会馆为了适宜当时的改革，与时俱进，敢为人先，率先开办新式学堂，从初级小学到中学，形成了会泽县城会馆办学的热潮。在整个办学中，采用现代教材，引进现代教学手段，并实行男女同校、倡导女孩子解小脚等，特别是在科学、民主方面，比起当地的政府，远远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成为那一时代的最强音，会馆也成为既